

汉字源流与汉字研究的新视角

毛远明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重庆市 400715)

摘要:随着地下材料不断出土和文字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汉字研究向学界提出更高要求。今后的汉字研究必须站在汉字发展史的高度,坚持汉字系统观、历史观、发展观,以构件研究为突破口,综合利用各学科成果,全面理清字际关系,在个案考察和系统研究基础上,注重文字学理论归纳和规律揭示。《汉字源流》在这些方面反映出新的研究视角,值得重视。

关键词:汉字学;系统观;历史观;字际关系;字族;汉字构件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6-0124-06

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必须阅读丰富珍贵的典籍,而阅读典籍要从认识汉字开始。认识汉字是有层次的,一般的识字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而知其所以然则需要研究文字。研究也有不同层次,一般说来,今文字的研究虽然也有困难,如异体字、俗别字、同形字、通假字等问题就比较扰人,但是相对说来要容易一些。古文字的研究则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文字释读这第一关就是拦路虎。而要贯通古今,站在汉字发展史的高度研究汉字源流,则更加困难,非大家、非通家、非专家不能涉足,1979年康殷出版过一本《文字源流浅说》^[1],是探索汉字源流的有益尝试,曾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这位画家受文字学理论和古文字考释功力的限制,其文字阐释、源流梳理大多主观臆测,结论可靠性差,其构想是对的,实践则多谬。2007年黄德宽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2]首次系统清理了汉字组群,并着手构建汉字谱系。其材料占有充分,考证精严,立论多可靠,算是一部研究汉字源流的力作。只是限于精力,该书仅清理了古文字谱系,而不涉今文字,因此只能是源,而却未及流。真正意义的汉字源流探索的最新成果当数2011年曾宪通、林志强的《汉字源流》^[3],研究汉字起源和流变的学问,既有汉字源流的理论阐释,又有汉字初文、字族等专题梳理,详细论述了探索汉字源流的路径,提出很多有关汉字未来研究的设想,给人以科学理论、研究思路和方法论的指导,反映出汉字研究的新思路、新动向、新视角。本文由汉字源流探索的路径,联想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思考,供方家教正。

一、关于汉字研究的系统观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系统符号。单个汉字看似是散在的、自由的,但又不是孤立的、原子主义的,而是彼此联系的、有机的整体,每个汉字符号都是汉字系统网络中的一个眼,都能在这个严密的系统中找到它的位置,都能清理出它与其他文字符号的区别与联系。从宏观上就整个汉字符号系统而论,它是有体系的,有发生、发展、变异、行废的规律。就汉字体系中的个体符号而论,也有创制、演变、行废的历程,在整个汉字体系的制约、影响下生成和变化。研究汉字,特别是清理汉字源流,

* 收稿日期:2013-01-18

作者简介:毛远明,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首席专家:黄德宽。

构建汉字史,必须树立汉字系统观,这个观点一再被《汉字源流》的作者所强调,明确指出汉字是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又是由许多小系统组成的^{[3]94-107}。考察汉字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观察,去分析,去阐释,比如有汉字构形系统、汉字孳生系统、汉字演变系统等。

汉字的系统性来源于客观事物以及反映客观事物的词汇的系统性。许慎是我国最早认识到汉字构形具有系统性的文字学家。他第一次对散在的、庞杂纷繁的汉字进行系统类分,是第一个分析、归纳汉字偏旁部首的学者。他的《说文解字》从众多汉字中归纳出 540 个部首,通过据形系联,把所收 9 000 多个汉字纳入不同的部首,若网在纲,如裘挈领,使部首相同、意义相关相联的汉字形成彼此联系的文字系统,很好地体现了文字系统观。《汉字源流》发挥这种科学的思想,以类聚理论为指导,以构形系联为基本手段,以初文和孳生字为考察重点,研究汉字内部结构关系,梳理出具有复杂亲缘关系的字族,通过字族把单字符号和汉字体系衔接起来,体现出作者科学的汉字系统观。

以“人”字族为例:人(左侧向)是独立的字。又经常作偏旁。在上下者作“人”,“企、介、欠”从之;在左旁变形作“亻”,例甚多,不赘;在下部变形作“儿”,“允、兒、兑、见、先、光”从之;倒作“匕”,“化”从之;加横作“壬”,“廷、挺”从之;右侧向作“匕”,“牝、匙”从之;变“卜”,“卧、咎”从之。两形相重,“比(亲密)”、“从(跟随)”、“北”(相背,后作“背”);三形相重,众(众立),“衆、聚、息、叢”从之。尸,屈膝蹲踞,“居、屋、屏、层、屨”从之。卩,人跪跽之形,“卿”从之。女,两手交胸跪跽之形;加两点特征性符号作“母”,两点连接作“毋”,加头饰作“每”;身,大肚之人,怀孕;长,长发扶杖长者;尾,象人臀部拖着尾巴,奴隶形象,“屈、属、尿、隶”从之;鬼,从人,象鬼头,“畏”字从之。立,正面人站地上;並,二人并列;大,正面站立,伸展四肢,大人之义,引申为凡大之称,“夹、乘、夷、爽、夸”等从之。“大”倒转、变形构成新字,如𠂇,倒逆之义,加形作“逆”;夭,人走路,头倾侧,两臂摆动,“走、奔”从之;𠂆,头倾侧不正,“吳”从之;交,人两腿相交,“郊、较、蛟、绞”等从之;尢,又作“允”,曲其一腿,“厖、𡗗、尫”从之;天,人额;夫,头上插簪,束发加冠,丈夫也,“(伴)”字从之,“攀”字又从“扶”;央,“大”上方表示区域;亦,“大”加指事符号,后作“腋”;無,人两手饰物以跳舞,后作“舞”。变形作“𠂇”,“及、负、危、色”从之。不仅如此,由初文“人”生成与“人”有关的一群初文如“比、从、北、大”等,又分别在各初文基础上产生新字,新字又作构件,二次甚至三次构字,如人变形作“大”,加横作“夫”,加不同形符,作“跬、扶、𡗗、肤”等,不断孳乳繁衍,结果便构成一个字族。该字族所有的字都或隐或显地含有“人”的义素,体现出汉字系统与汉语词义系统具有或亲或疏、若隐若现的关系。

二、研究汉字要坚持历史观

中华民族是没有断层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这个民族创造的文化属于没有间断的连续性类型的文化,记录中华民族辉煌历史文化的文字载体,属于连续性文字类型。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距今约 5 000 年的埃及圣书字、巴比伦楔形文字,是灿烂文明的象征,可惜这些文字早已被淘汰,成为死去的古老文字。唯有汉字源最远,流最长。已经比较成熟的、成系统的甲骨文距今已有 3 500 年的历史,若寻其源头,大约可以推到五、六千年前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自甲骨文以来,尽管汉字体态、字形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其基本格局、基本特征、基本性质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直至今日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面对汉字这一庞杂的历史堆积物,要进行科学的梳理和全面的研究,必须树立历史的观念。要像考古学分析地层那样,清理出汉字生成、发展的历史层次。这个认识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理解:就整个汉字符号系统而言,有它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如汉字的起源,汉字系统的完成,汉字体态的变化,汉字结构的简化、繁化、声化、同化、异化、类化、记号化、规范化等,都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时代特征,都有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就汉字个体而言,作为汉字系统的一个单元,也有创制、发展、变异的历史过程。而个体变化又不是随意的,始终要受到汉字系统的制约,并对汉字系统具有反作用,影响汉字系统的内部调整和改造。两个层面相辅而行,互相依赖,彼此支撑,就有可能把单

个汉字的演变脉络和整个汉字系统的发展轨迹从史的角度科学描述出来。

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4]，以表格形式汇集不同历史阶段的古文字，意在展示不同形体之间的历史联系与区别，史的观念是明确的，只是材料不足，古文字字料很有限，又受体例限制，没有进行理论探讨。不过受其启发，再加上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当前文字学界对汉字构形演变的研究和汉字谱系的建立已经逐渐形成研究的热点。《汉字源流》在这两方面都有精彩表现。其构形演变研究体现在第四章对汉字偏旁的分析和第五章特殊结构分析，既有构形的共时描写，又有历史演变的具体分析，如考察隶变的偏旁变异、混同对汉字偏旁的影响^{[3]108-114}、现代汉字形近偏旁各字的历史来源分析^{[3]49}，还有构形理论的深入探索和构形规律的揭示。而汉字谱系研究则体现在第三章汉字初文的清理和第六章汉字源流例析，个案的考释相当深入，梳理十分细致，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史的观照下进行的，应该说其研究真正做到了站在学科前沿观察和思考问题。

如果没有历史的观点，要理清这些文字的来龙去脉、彼此关系无疑是很困难的。经过作者的源流追踪，全面梳理，文字的系统 and 演变脉络就涣然冰释了。

三、特别强调字词关系

研究汉字必须强调字词关系，这是文字的表词功能决定的。从本质上说，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系统符号，其功能是记录词的，字形与它所记录的词的音义之间有系统的对应关系，形音体系的汉字尤其重视字形释义，字词之间联系紧密。研究文字不能只顾及字形，而不关注字形所记录的词。汉字构形学、形义学、字样学不是彼此隔绝的壁垒，而是应该互相沟通，彼此借鉴，综合利用各分支学科的理论 and 成果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才可能把汉字系统，汉字源流演变，汉字性质、特征和字用功能研究深透，对疑难字的考释也才可能更加准确、科学。《汉字源流》在研究汉字初文时，认为“初文或字原一般都是记录汉语的基本词汇的，所以我们要结合汉语基本词汇来研究初文”^{[3]114}。在分析现代汉字形近偏旁之后，作者总结对形近偏旁要真正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要注重溯源，利用古文字材料分析其最初的形态和所表现的涵义；二要注意探流，把它们放在文字演变的过程中进行考察，看它们发生了哪些变化，什么因素使它们变得形体相近不易区别；三要注意形音义之间的联系，有哪些形体上比较接近的偏旁，通过形义关系或形音关系，往往可以区别开来。”^{[3]145}

《汉字源流》重视字词关系，集中表现在第六章“汉字源流释例”和第七章“汉字源流研究的拓展”。其源流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字形发展线索，是汉字源流研究最核心和最重要的系列，尽可能依靠现存古今文字资料，立体、形象、全面地展现一个个汉字形体演变的脉络；二是字义发展线索，借助字形结构分析和文献语言用例来共同证明，弄清文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三是字音线索，掌握古今语音流变，便于因声以求义，梳理字际关系，解决文字假借、声符表音、同源分化、字组字族等字形与音义之间复杂而又有序的各种关系。为此，梳理汉字源流的选字原则就是：一是字的形、音、义三方面必须全面贯通，二是古今形体的系列必须大体完备，尤其是先秦古文字和秦汉篆隶文字是必备元素^{[3]160-162}。可见其研究思路贯穿了历史的、形音义系统联系的科学语言观，并把这种思想具体落实到具体例释的注音、排谱、说解中，从字形谱系入手，联系词的音义，揭示形体流变、词义引申、语音转变的各种现象及其轨迹，在文字的具体考释中，得到更多创获，如“风”字^{[3]181-182}、“壙”字^{[3]211}、“藉与作”^{[3]212}、“貂与繇”^{[3]213}、“虞与業”^{[3]88}等字词的解和考辨，能发前人所未发，从多角度考证文字形音义，纵横捭阖，证据充分，精义迭出。

字族系联的思想揭示了个体汉字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可以把词汇的扩散和文字的孳乳结合起来考察其互动关系，把伴随词汇衍生同文字创制的思维联想和心理类推结合起来揭示字族符号与同族词、同源词的复杂关系，达到文字同语言结合的更高水平，还可以借助语言文字的研究，窥探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思维范式和心理潜质，达到语言与文化结合研究的新境界。

四、以偏旁构件作为研究汉字演变的突破口

就文字形体结构类型而论,汉字属于组合型文字,是由零部件按照一定的规则组装起来的。在字形结构上具有组装的层次性和层级的有序性。其底层构形单位是笔画,由笔画组成构件(《汉字源流》称“偏旁”),再由构件或构件组合构成整字。当然,具体构字时,各层级允许有空缺、重迭和交叉。由于笔画是构成汉字的原子,数量非常有限,难以统率数以万计的汉字,故以几个简单的笔画为单位去研究汉字系统,是不现实的,无法实施的;而汉字个体又数量繁多,字际关系十分复杂,形体构造异常纷繁,故试图以一个个整字为单位去清理汉字系统也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而构件是汉字的基本构形单位,是汉字构形系统的核心,而数量又相对有限,具有封闭性。从形义关系的角度考察,用各种带有音义信息的符号组装起来的汉字,其理据表现于构件与字音、字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是有序的,成系统的,有规律的。从文字形体历时变化的角度考察,汉字的演变又集中体现于偏旁构件的变化。构件不仅是汉字组装的核心要素,还是字音、字义的最小载体,相当数量的构件本身就是形音义兼备的成字构件,独立运用时,是一个汉字,组构的时候是一个构件,根据形义对应的原则,会以各种方式将其原有的音、义带进新字,成为新字形体的一部分。汉字构形的这种特征在保持汉字的性质、揭示汉字的演变、分析汉字的构字理据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现出它的特殊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因此,研究构件是研究汉字构形、汉字演变、汉字学、汉字史的重要任务。

构件的研究内容主要应包括构件的层级拆分、构件的数量统计、构件的构字频率调查、构件主形的选择与确立、构件之间的形源关系、构件变异与混同、构件的组装、构件和字音字义的关系等。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汉字构形研究,并不要求构件的所有问题都要讨论,可以根据研究目标的不同确定研究的重点。《汉字源流》从古今汉字偏旁演变的角度切入,重要研究三个问题:其一,偏旁的演进和流变。讨论汉字偏旁涉及的相关概念,将组成合体字的所有部件统称偏旁,与构件、部件、字符的概念大体相当,认为“绝大多数汉字是依层次组合的,不同层次上的偏旁部件或字符,其功能也是不一样的”^{[3]145}。如“骤”,可以切分成三个层次,“马”与“聚”是第一层次;“取”与“众”的变体是第二层次;“耳”与“又”,“众”的变体为三“人”,二者并列是第三层次。作者回溯了古今汉字偏旁数量的变化以及对偏旁部首的认识过程。其二,隶变对汉字偏旁的影响。以古文字到今文字过渡的隶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具体讨论隶变造成的偏旁变异和混同对汉字的巨大影响,抓住了汉字古今交替的要害。其三,从现实需要出发,讨论汉字形体在简化、声化、规范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动、调整和重组,具体辨析现代汉字形近偏旁,以避免误解和误用。这种古今贯通,点面相间,重点突出,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指导相结合,条分缕析的研究思路是很值得借鉴的。

五、各学科成果与出土文献新材料的综合利用

讨论汉字的起源,作者就利用了以下学科的成果来论述:一是文献学的探索。根据《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荀子·解蔽》“仓颉作书”,认为汉字是由集体创作到专业整理的过程。二是民俗学的探索。作者利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多个民族关于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的材料,证明汉字表形、表义、表音三个方面的造字原则,早在先民实物记事过程中就已初露端倪。三是考古学的探索。利用考古发现的大量远古时期的陶片刻划、彩陶符号、岩画,认为这些刻画记号、象形符号、图形族徽等古老符号就是汉字的祖先。四是语言学的探索。认为文字符号从间接表词到直接表词,从象形表词到以音表词,从象形、表音到形兼声表词,汉字造字法留下了汉字发展的轨迹。作者使用这些材料、理论和研究成果,证明汉字起源于奴隶制国家开始建立的夏代,属于华夏民族的自源文字,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外来文字说。

鉴于汉字起源的实证不足,造字法与表词的关系,书写符号记录有声语言的过程,从汉字起源

到系统成熟的甲骨文字之间的过渡状况,发展序列等至今还缺乏有力的证据,因此成为研究汉字起源的难题。目前学界还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完全找到科学破解的钥匙。不过作者提议,可以利用符号学、心理学、比较文字学理论和成果,用多元思维去解开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虽然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想,距离实证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研究的路径也还缺乏具体的举证,但是这种有益的学术前沿思考,反映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同时,出土文献也是研究汉字最主要的依据。根据载体存在形式不同,可以把文献分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多雕版印刷,对汉字进行了最有效的规整,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版刻使文字形态基本丧失,再加上屡经翻刻,文字结构、字形面貌多被改动,其文字已经无法准确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汉字的实际情况。要想利用传世材料描述某个时期汉字的面貌、特征,揭示汉字的演变历程,建立汉字史,那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要研究各时期汉字的实际面貌和演变规律,出土材料如甲金、简帛、碑刻、写卷、抄卷等是最可信任、最具实证价值的。例如繁体“斷”变成简体“断”字,一般以为是草书楷化,但如果利用出土材料,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它实际上是重迭符号连续替代,并不断规整演变的结果^[5],我们就可以利用出土的两晋南北朝碑志来证明。《李挺墓志》中右边的构意符号原本由四个“么”重迭使用,文字太繁重,于是下面两个“么”分别用简单符号替代,《元侔墓志》、《元倪墓志》、《元勰妃李媛华墓志》、《元延明妃冯氏墓志》都是典型例字。然后再从下往上类推,又分别用简单符号替换上面的两个“么”,《元湛墓志》、《道宝碑记》、《关胜碑》是其典型字例。四个“么”变成了四个简单符号,四点之间左右没有隔开,既不便于书写时位置的摆放,又有失于汉字内部结构的平衡,结字也显得不紧凑,有损于文字的结构美,于是又添上一竖,造出“断”字。《元引墓志》、《司马悦墓志》是其典型例字。字形的变化,使原来表意的文字,成为不表意的记号,但是该字的基本轮廓还是保留了下来。

《汉字源流》特别强调出土文献对于汉字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溯源工作必须尽可能追溯到该字的原始形态,越古越好,越远越具说服力。所以,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就显得特别可贵,而篆隶材料则是阐明古文字如何演变为今文字的重要桥梁,在梳理汉字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往往起着衔接和转换的关键作用。”^{[3]144}在讨论篆隶文字时,作者进一步强调“篆隶是秦代简牍和西汉前期的竹简和帛书发现后带给人们的新认识”^{[3]126},新材料带来新学问,这已是无需再辩的事实。在讨论省声时指出“随着地下出土材料的不断涌现,过去认为不可理解的某些‘省声’字,现在看来确是可信的”,如“家”的“豕”省声,“汉”的“難”省声,“产”的“彦”省声,都是有力的证明^{[3]232}。《汉字源流》在探源溯流的全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大批出土新材料,而传世材料只是作为出土材料的参考或补充,因此其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能得到充分保障。

六、注重理论归纳和规律揭示

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材料的考释、描写是目,理论归纳、抽象是纲,纲举才能目张。对文字个案的精湛考证,字族的示范梳理是《汉字源流》的一大特色,能发前人所未发,创获甚丰。作者同时也十分注意汉字演变轨迹的理论分析和汉字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这是汉字研究的理论升华,值得欢迎。我们举其突出的三点来评说。

其一,关于汉字源流发展谱系的科学建立,必须充分占有汉字发展的具体材料,客观梳理汉字演变轨迹^{[3]144},要充分运用文字学理论,对材料科学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合理判断和逻辑推论。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字形发展的线索。要厘清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源流脉络,溯源要尽量追溯到文字最原始的状态,探流要观察到汉字发展的每一个足迹,篆书、篆隶、隶变、楷化、行草书、繁化、简化、俗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二是字义发展线索。重点弄清楚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引申义以及文字具体使用中出现的假借义,始终坚守文字是语言的系统书写符号这个本质属性,符号是为意义服务的,离开语义,符号便失去其价值。三是字音方面的线索。语义借助语音而存在,文字记

录语义,同时也记录了语音。古今语音、语义变化都很大,文字是怎样适应这种变化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借音表义、同形异词、异形同词、声符表音、同源分化、字组字族等现象都不能回避。如果文字形、音、义系统完全贯通了,古今形体的系列基本清理完备了,汉字源流发展谱系才可望科学建立起来。比如,笔者与何山对“兒”的形体演变的俗变考察,就是这一规律的典型说明^[6]。

其二,关于汉字行废原因探索,作者通过对汉字初文、汉字偏旁、特殊结构以及单个汉字的个案研究之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宏观上看,时代演进、语言发展、材质变化、字体革新是汉字行废变化的主要因素;汉字的繁化与简化、音化与意化、分化与同化、变异与规范,也是汉字行废的原因。从微观上看,形声字较表意字易于流行,形义关系清晰的字较形义关系模糊的字易于流行,字形简单的字较复杂的字易于流行,区别度高的字较区别度低的字易于流行,适应社会需求的字较古旧过时的字易于流行,社会约定俗成的作用大于构形理据的力量^{[3]95}。这些归纳为掌握汉字发展演变规律,了解社会用字的文化心理,促进汉字的健康发展,以及为今后汉字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和科学的理论思考。

其三,关于汉字字体的历史演变,作者十分注意对字体过渡形态的考察。由于隶变改变了先秦象形符号表意的文字特征,把古文字的象形符号彻底改变成抽象化程度极高的线条符号,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基础。而完成古今文字过渡的关键是秦汉之交的篆隶文字。《汉字源流》特别强调研究篆隶的重要性,是很有学术眼光的。由于考古新发现,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大量出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作为简牍帛书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作者通过深入钻研,归纳出隶变的四大特征:一是把篆文随体诘屈的线条改变成平正方直的笔画;二是合并、简化繁复的笔画和构件,使汉字结构更加简单,书写更加方便;三是改变篆文的偏旁位置,使结构方式成为汉字的区别特征;四是解散篆文的某些结体,经过变形、省略、归并、黏合,偏旁重组,重新确立汉字结构方式^{[3]226}。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汉字源流》还特别注意汉字源流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指出要把传统六书原理作为理论武器,要学会析字和拼字,要着重学好独体字,要熟悉孳乳能力强的偏旁部件及其流变,要探索字族等,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潜心研究文字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思考和经验之谈,不仅对一般大学生有益,对汉字研究工作者也很有帮助。

阅读《汉字源流》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关于字族和词族问题。从系统论的高度清理汉字在历史进程中的孳生繁衍,把散在的单个汉字系联在大大小小的字族中,以呈现汉字的系统性,描写其衍生路径,揭示内部规律,又形音义结合,全方位讨论文字衍生和词汇同源分化之间的关系,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但是文字毕竟不是语言的要素,字族只是文字符号的聚合。文字的衍生与词的分化有时是同步的,字族相同,词源也相同,但有时又是不同步的,字族同,词源不一定相同。二是书中研究汉字结构,使用“偏旁”这个术语,所指实际上是构字部件或构字符号,似乎使用“字符”,或者使用“构件”更加明晰,可以避免搅扰和不必要的解释说明。三是有的文字现象还可以斟酌,如认为《史记》中的“蚤”通“早”是古人写别字,是本有其字的通假^{[3]38}。其实司马迁时代可能“早”字还没有产生,自然也就无所谓写别字^[7]。

参考文献:

- [1] 康殷. 文字源流浅说[M].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79.
- [2] 黄德宽,主编. 古文字谱系疏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3] 曾宪通,林志强. 汉字源流[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 [4] 徐中舒,主编.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5] 毛远明.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6] 毛远明,何山. 兒的俗变考察[J]. 中国语文,2010(6):557-560.
- [7] 毛远明. 汉字假借性质之历时考察[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76-180.

责任编辑 韩云波